

■我的文学观

再勇敢地往前走几步

□弦 河(仡佬族)



弦河,本名刘明礼,仡佬族,1988年生于贵州石阡,现居杭州,就职于某办公家具企业。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十月》《青年文学》等刊

我为什么会写作?

一个原因是不甘心。我家三代都是农民,我的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小时候读书,大人会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大家的想法就是你读好了,就能走出农村,挣很多钱,能变得不一样。你要问我,父亲那一辈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想法还是老一套——读完书,成家,生孩子,传宗接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我就这么活着,跟重复我父辈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我不甘心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文化可以拯救我,也可以拯救这片土地。这种信念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长久沉淀下来的生命感知,渗透在我近些年大部分的创作里。作品之中,寄存着我对周遭人事的全部审视、困惑与共情。而我所凝望的“世界”,从来不是遥远辽阔的天地,而是我年少生长、烟火蔓延的故土。

这两年,我经历了不少事情,心态慢慢变了,常常会想,其实身边的人就那样安安穩穩地生活,也挺好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我曾经写过小说,写一条稻花鱼,最终只写了一小段。在那一小段文字里,我真心想探讨的问题是,人人都清楚鱼天生就只能生活在水里,可是如果它拼尽全力,非要跳出去,去到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空间生活,这件事到底对不对?这几年,我总是反反复复地琢磨这件事。

我最早接触诗歌,其实就是从课本上来的。以前我很少读课外书。我写过一篇笔记,回忆自己小学到初中那段日子,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还有课外书这回事。一直到初三,我们乡里新修了学校,有了一间图书室,我才开始借书来看。

童年里只有一次例外。大概五年级或者六年级,我父亲

去县城,不知道别人送给他的,还是他自己买的,带回来一本《作文大王》。这本书我印象很深,里面有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六月的天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而真正带我走进诗歌深处的人,是我的一位初中同学。他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平日里无暇照料他,便给他买了大量的教辅练习册和课外书籍,他无法全部做完、读完,便常常把多余的练习册送给我。如今回想起来,我能够顺利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赠予的那些练习资料。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从他那里读到了改变我写作底色的一本书——《浮士德》。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接触纯粹的诗歌文本,触摸到了诗歌宏大、深沉又充满挣扎的精神内核。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贯穿了我后续所有的创作。我作品里与生俱来的忧郁与思辨气质,大多源于这次阅读体验。

2008年,我高中辍学,来到广东一家铝厂的流水线工作。奔波劳碌的打工岁月里,诗歌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没有规整的稿纸,只能在工厂废弃的报纸、废旧报表的空白处,写下一段段不成章法的分行文字。我心底始终藏着一份炽热的渴望,期盼这些潦草的文字,终有一日能变成刊物上工整的铅字。如今回头审视,连我自己都难以说清这份扎根心底的文学执念从何而来,但它们始终在我心中生生不息。

一晃近20年,即便我从未正式出版个人作品集,但多年来的创作让我有幸赶上了中国作家协会入会申请的变革,线上审批流程的推行、刊物发表作品的申报条件落地,为基层写作者敞开了通道。2021年,经过第二次申报,我成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这是我在提笔写作的最初岁月里,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2024年底,我的两首诗歌作品在《人民文学》刊发。老家石阡县文联的老师特意告知,这是石阡县作家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我无法核对信息真假。但是,从早年初次在《贵州日报》《知心姐姐》等报刊零星发表文字,到登上国家级文学核心刊物,作为一名从乡土、从流水线走出来的基层写作者,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无比珍贵。这是命运赠予我的幸运,更是漫长枯燥的写作生涯里,最滚烫、最治愈的精神慰藉。它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盏灯,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我在它身上得到了救赎。

前些年,我心里甚至生出过一段旁人看来有些狂妄的想法:我日复一日地坚持与努力,不只是为了成全自己,更是想告诉所有和我出身相同、处境相似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挣脱固有境遇的可能。我不清楚自己未来还能写多久,在文学这条路上还能走多远,但我始终怀揣一个朴素的期许,希望未来某一天,有一个和我一样从乡土出发、无人引路的追光者,在人生路上困顿迷茫、步履滞滞的时候,一无所获看见我。他会看见,有一个写作者也曾身处泥泞、头无所有,没有优渥的环境,仅凭一腔热爱与倔强一步步走到今天。或许就是这一点点微弱的参照,就能让他多一份底气,多一份坚持,再勇敢地往前走几步。

我深知自己一路走来,从来不是凭空成长。在我年少迷茫、艰难跋涉的岁月里,也曾被他人的微光照亮,被陌生的温柔、平凡的坚持治愈、托举,是那些细碎的光,支撑我熬过无数困顿的时刻,走到了今天。正因经历过黑暗、看见过微光,所以我也想努力活成一盏灯,尽力为同路人照亮一段前路。

对我们基层写作者而言,写作最珍贵的意义,是漫长坚守后被看见、被认可的情感共鸣,是挣脱自卑与桎梏后,敢于坦然认同自我的身份自觉,是让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笃定自己也能拥有丰盈且不平凡的精神力量。



诺布朗杰,藏族,1989年生于甘肃甘南。中国作协会员,甘南藏族自治州作协副主席,舟曲县作协主席。甘肃省文艺创作传播中心签约作家。获第五、六届甘肃黄河文学奖。著有诗集《蓝经幡》《拾句集》等

我生活在相对偏远的甘南舟曲县,闲暇时写写诗,但我的诗作常常受到批评,批评者大多是同行,他们说得最多的,便是我的诗“读不懂,生涩”。这让我对自己的新诗创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自我怀疑与持续反思之中,我才慢慢成长。写作从无捷径可走,每一位有所成就的作家,都离不开长期的阅读积累,历经世事,长年累月伏案创作、反复摸索。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收获都是与时间漫长较量后的结果。

这几年,我写了不少创作谈。比起写诗,写创作谈反而轻松很多。写作多年,说实话,我自认为对诗歌的理解并不深入,对现代诗的认识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有一点能确定的是,诗歌有很长一段时间离读者太远。现代诗过于小众,常遭诟病。诗歌与诗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大众。这很关键。我写诗的态度是:休做高深莫测的诗人,不写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诗歌不要远离生活,应该积极融入生活、干预社会。拒绝闭门造车,我们需要从书斋走出来,用文字丈量天地。不能靠别人的经验去创作,不能脱离生活去创作。有些诗人靠大量间接经验推进自己的创作,虽然他们也能创作出很好的诗歌文本,但往往与现实生活相脱离。诗人也有必要多谈一下创作经历,不要拒绝新媒体与短视频,让读者更好地走进诗人的诗歌世界,这是当下大众认识新诗和诗人的一种途径。还要学会接受新生物。接受不等于妥协,是拓宽思路的开始。

同时,我不主张诗歌刻意晦涩、制造阅读壁垒,更无意让诗歌和读者相互对立,但也不认同诗人为追求通俗易懂,放弃艺术上的突破与探索,这同样是对创作的不负责。诗人必须有自己坚守的东西。持续创作的过程中,人会慢慢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创作技巧。技巧可以习得,也能够被模仿,但一个人的认知高度、思想维度,无从照搬,难以复刻。有些写作技巧运用在诗中,能立刻为作品带来更强的质感。可若是反复依赖同一种手法,久而久之便会固化成套

心底的热爱,胜过所有的豪言

□诺布朗杰(藏族)

路。不少诗人便困于此,长期停留在创作的舒适区,不愿向外突破。这也是我始终认为创作需要向上突破的缘由。

我的创作一直在发生变化。初学写诗时写口号诗、抒情诗、朗诵体,之后尝试融入叙事,再慢慢走向对现实生活的介入。与之相伴,我的创作理念也始终发生着细微更迭。想要让诗歌的质地日渐丰盈,就需要以新的认知审视、推翻旧有的成见,在过往思路之上寻找全新的表达。我期待自己的诗作,能够带给读者思考,促成认知层面的启发,而非仅仅作为获取知识的载体。

很多小说家说过,小说的底色是真实。我认同这句话,同时认为,诗歌的底色也应当是真实的。我也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践行这一点。能够打动人心的,永远是真情实感。不少写作者为了省事,轻易取用了大量二手经验。要知道,对创作者而言,一手经验才最为珍贵。当下许多诗歌同质化严重,不少诗人的作品缺少个人辨识度,根源就在于长期浸泡在他人的语境与经验之中,没能找准属于自己的创作坐标,更未能摸索出独有的写作风格。

多年书写,彻底打开了我的世界,也拓宽了我的思维与眼界。在创作中,我始终保持清醒,既怀疑世间所有固化的定论,也真诚相信世间所有的温暖与纯粹。诗歌重塑了我,让我变得通透豁达,也让我变得细腻敏感,让我兼具谦逊与博大,心怀细微与辽阔。创作本就是一场修行,写不出字句时,满心焦躁不安、内心焦灼;落笔成诗、完成作品后,又满心释然、欣喜万千。说到底,心底纯粹的热爱,永远胜过所有空洞的豪言壮语。种种细腻、微妙、复杂的情绪,始终在我胸口汹涌起伏。我不愿在写作中刻意拔高声调,只想从喧嚣中悄然退出,归于平静,安心书写。多年写诗,也让我看清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深知诗坛高手林立,也看清了自己的渺小与不足。我唯有坚持不断阅读、不断思考、不断行走、不断书写,在漫长岁月中深耕不辍,慢慢精进成长。

春官词的民俗重构与时代新生

□赵炳庭

六盘山春官词,是宁夏西海固地区流传千百年的口头说唱,也是当地颇具代表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以来,学界谈及春官词,多着眼于文学美感和节日表象,较少深挖其背后的民俗内涵。朱进国的《六盘山春官词研究》立足乡土田野调查,关注民俗的现实传承状态,系统梳理了春官词的源流演变、文本特征、审美内涵与社会功用,弥补了西北口头民俗研究的不少缺憾。该书站在民俗学的立场,把零散的说唱文本、即兴表演形式、乡间礼俗实践整合为一套完整的民俗体系,真切再现黄土高原百姓的生活节奏与精神世界。

春风吹过陇地,村村社鼓响起。春官手持羽扇,穿行于村落沟壑,随口吟唱,自成韵文。岁时节令与农耕习俗,构成传统乡村社会重要的民俗底色,也是民俗研究的基础内容。春官最早是朝廷掌管迎春、授时、祭祀的官职,隋唐之后慢慢渗入民间社火活动,到清代彻底脱离官方体系,演变为乡间迎春祈福的民俗角色。朱进国在书中梳理清楚这一制度下移民间的完整过程。春官词保留了基层民众眼中真实的农耕生活。书中收录的节气唱词,把二十四节气和农事生产、地方习俗紧密结合:“二月里那犁百虫醒,春分春暖太阳红。金犁插进软土里,人欢马叫忙春耕。”短短几句,写出六盘山乡间春耕的热闹场面,把物候变化、农作劳动和百姓生计融为一体。旧时不少乡村百姓识字有限,春官走家串户说唱,就相当于通俗易懂的农事读本。依托大量田野搜集得来的唱词文本,《六盘山春官词研究》复原了西北民间迎春、鞭春牛、新年祈福等民俗场景,印证了官方礼仪逐步下沉乡土、发生地方化改造的历史过程。

我们还可以借由春官词触摸乡土社会民众的内心世界,读懂民间信仰与民间教化如何在

乡村落地生根。春官词来自乡士民间,不刻意雕琢辞藻,却真实承载着当地人的喜怒哀乐、是非取舍。朱进国深入挖掘唱词背后的民间信仰与教化功能,把握民俗文化的核心内核。六盘山乡士民风醇厚,向善崇德,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有赖于春官说唱代代浸润。书中收录不少劝世类唱词,不讲空洞大道理,用通俗诙谐的韵文劝导乡民。“赌博是个害人精,害了自己害别人。只有连根铲除掉,人民才能享太平。”直白道出赌博的危害,贴合乡村现实,发挥出民间教化的作用。春官词也寄托着老百姓朴素的世俗愿望,传递出家宅平安、五谷丰登、阖家顺遂的寓意。遇到灾荒动荡,唱词会感慨民生疾苦、针砭现实;社会安定之后,又歌唱时代新貌。唱词内容跟着现实生活不断变化,记录下普通民众真实的精神诉求。

精神与教化的表达,终究要依托现场的表演实践来完成,这也让春官词成为观察口头表演民俗不可多得的样本。春官词没有固定底本,讲究临场即兴,重视表演者和听众之间的互动,每一次进村说唱,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民俗实践。朱进国在书中细致分析春官词的表演方式、创作逻辑与现场特点,为研究西北口头表演民俗提供典型案例。春官说唱多以七言四句为基本句式,朗朗上口,配合社火锣鼓、融语言、节奏、现场表演于一体。春官走到哪里,就根据眼前景象即兴编词,见到孩童便祝愿茁壮成长,见到农家便祈盼五谷丰登,面对乡贤便称颂德行,灵活适配不同场景。正如书中所论,春官词的生命力,并不完全来自整理出版的书面文本,而在于现场即兴生成、表演者与民众互动的整个过程。民俗表演理论认为,民俗不是静态的文字材料,而是特定环境下,表演者、受众共同参与形成的实践活动。《六盘山春官词研究》完整

展现这一点:春官的衣着羽扇、锣鼓伴奏、登门礼节、临场演唱,共同构成完整的表演民俗。

在一场场登门说唱的表演之中,一套乡土社会代代遵循的交往礼俗被不断演绎、传承。中华礼俗包含国家层面的典章礼制,也包含民间日常交往的乡俗礼仪。官方礼制文献保存较为完备,但散落在民间生活中的待人接物之礼,大多缺少文字记录,很容易随着社会变迁慢慢消失。朱进国的研究对六盘山的乡士礼仪做了抢救式的整理,意义尤为可贵。春官说唱遵循一套乡间礼仪,集中体现“律己敬人、谦和待人”的处世观念。书中所录待客唱词“且慢走,且慢走,我和年兄握个手,我的招待礼当轻,礼轻重暖人心”,真切表现乡村人际交往的诚恳宽厚;离别唱词“社火忙,社火躁,我送亲朋出院门”,尽显乡土社会温和含蓄的待客分寸。城镇化不断推进,很多传统乡间礼仪日渐淡化。春官词以口头韵文的形式,保存下乡村谦卑友善、重和睦、讲德行的交往伦理。该书区分春官民俗中内在的道德观念与外在行为仪节,还原西北乡士礼仪本来面貌,为研究民间礼仪的传承演变及其当代转化,提供珍贵的民俗样本。

《六盘山春官词研究》还将目光投向春官词的当代境遇,为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思考。民俗文化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活态流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朱进国的研究不只回溯旧时代民俗面貌,同样关注春官词在当代社会的转型与传承。旧时春官词主要是服务农耕社会迎春祈福的年份;进入当代,内容不断更新,把乡村振兴、惠民政策、文明新风写进唱词。表演空间也从田间院落,拓展到舞台展演、文旅活动,衍生出文创产品等新的传承形式。朱进国辩证看待春官文化的守正与创新,既肯定其坚守乡土内核的价值,也如实指出现实困



春官说唱 来源:宁夏新闻网

境:即兴说唱技艺后继乏人,原生村落表演场景不断萎缩,传承人队伍亟待接续。这一个案也为西北口头类非遗保护带来启示:活态保护不等于把民俗封存在档案之中,而是要守住文化内核,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重新融入民众生活。

当然,这部著作仍留有继续拓展的空间。书中对女性参与者、青年传承人的实地访谈相对有限,部分即兴说唱的现场情境,还可以通过更多

田野记录加以还原。但总体来看,《六盘山春官词研究》是一部扎根乡土、材料扎实的西北民俗研究著作。它以春官词这一地方民俗为切入点,把民间说唱转化为解读西北乡土社会的重要文本,抢救整理不少濒临消散的乡土资料,填补了西北口头民俗系统性研究的部分空白,让流传乡野的春官说唱获得了严谨的学术阐释。

(作者系宁夏西吉县一中退休教师)